

读书评论

文化史视野下的大众科学

读 R. 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

陈巍

—

弗兰克·安东·麦斯迈尔 (Frank Anton Mesmer, 1734—1815) 与以其命名的催眠术 (mesmerism) 或“动物磁性论” (animal magnetism) 是启蒙运动科学史研究中饶有趣味的一个领域,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这个主题却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科学史领域,学者普遍对它缺乏兴趣,而且评价不高。丹皮尔认为,麦斯迈尔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是“电在生理学中的作用的研究庸俗化”。^①在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和墨菲等人的《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两部心理学史经典著作中,影响长达 60 年的麦斯迈尔催眠术所占篇幅都很短,而且从相关章节所附的文献来看,之前几乎没有对催眠术进行研究的专著,不过前者介绍得相对详细一些。^②另一方面在哲学领域,由于麦斯迈尔在德国、奥地利与瑞士交界的波登湖地区出生并去世,而且他的思想又与浪漫主义有密切关系,因此德、奥、瑞等国学者对动物磁性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总体而言少有波澜。值得一提的是,1966 年在麦斯迈尔的故乡米尔斯堡 (Meersburg) 举行了纪念麦斯迈尔逝世 150 周年的活动,本茨 (Ernst Benz) 的演讲是对麦斯迈尔哲学理念的一次较好梳理。^③相比之下,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 于 1968 年出版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一书(以下简称《催眠术》)则可称为催眠术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该书发掘了这个被历史学家长期忽视的题材,并深入讨论了催眠术与大众文化、激进政治思想以及启蒙运动终结的关系,大大拓展了学者们的研究视

作者简介:陈巍,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读硕士生。电子邮件:chrisminte@gmail.com。

① 丹皮尔 1975, 页 303。

② 波林 1982, 页 116—133; 墨菲等 1980, 页 153—155, 272。

③ Benz 1977。

野。此后,从文化史、社会史角度对催眠术进行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相关书籍出版了数十种,主题涉及多个领域。可以说达恩顿的这本著作成了催眠术研究的基石。

此外,正如《科学》的书评所说,该书是“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一项出色且具有典范意味的工作”。^①20世纪中期,与“新政治史”和“新经济史”的发展相比,倾向于个别性的思想史研究却显得过于落后。达恩顿曾在1970年代末警告说:“20年前,思想史是历史学科的皇后,而目前,这一地位变得卑贱了。”^②在这前后,思想史家们开始转移研究重心,逐渐把目光从以往的伟人投向平民。达恩顿受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影响,萌生了自下而上研究思想史和启蒙运动的念头。^③随着思想史家开始注意下层人物的活动,他们的阅读范围也逐渐扩大,^④开始使用原来被忽视的材料。达恩顿在《催眠术》中大量使用当时的科学期刊和小册子、歌谣、街头漫画、私人信件、日记、警署报告、沙龙记录作为史料,^⑤现在看来这大概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堪称先驱。另一方面,此时法国的年鉴学派开始重视对心态史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达恩顿后来的一本书《屠猫记》就成为心态史研究中最重要著作之一,他在一次访谈中称《屠猫记》延续了《催眠术》的研究方向。因此从研究思路和成书年代来说,《催眠术》在心态史研究中占有先行者的地位。同时达恩顿也承认在写作《催眠术》时,“从未听说过当时正在巴黎得到发展的这种研究取向。”^⑥达恩顿并非正统的年鉴学派成员,这可能降低了该学派对《催眠术》重要性的评价。而在历史人类学领域,1968年后达恩顿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长期合作,发展出与年鉴学派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但这是《催眠术》出版之后的事情了。如果从整个新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催眠术》作为专著,出版时间上大约只晚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1963年)和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本南丹蒂》(1966年)而排第三位。以上大约是《催眠术》一书在史学史上的位置。

对于达恩顿本人而言,《催眠术》是他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两年,负责报道凶杀案件,这让他形成了“尊重读者,不使用术语并且尽力以生动而直接的方式”的写作风格。^⑦《催眠术》叙述流畅,修辞

① Young 1969.

② 王晴佳 2002, 页 240。

③ 关于达恩顿的学术渊源,可参考庞冠群 2007。

④ 对20世纪60年代后的新思想史的介绍,可参考王晴佳 2002, 页 240—241。

⑤ Darnton 1968, p. vii.

⑥ 帕拉蕾丝—伯克 2006, 页 205。

⑦ 帕拉蕾丝—伯克 2006, 页 199。

优雅,值得学人借鉴。

《催眠术》始于这样一个在以往局限于研究伟大人物的思想史中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那时候最伟大的政治论著——《社会契约论》都没法打动那些有教养的法国人,什么形式的激进思想合乎他们的口味呢?”^①这个问题逼迫学者必须去考虑精英文化与大众思想之间的互动,去探索当时法国人究竟热衷于什么东西。接下来《催眠术》一书围绕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催眠术在当时的法国是怎样流行的?(第1章)催眠术怎样与激进的政治思想合为一体?(第2—4章)以及催眠术怎样昭示了启蒙运动的终结?(第5章)这三个问题也是作者在该书结论中重点解答的。很明显,这是描述性而非阐释性的问题。从该书出版至今已40年,这样描述性的问题已经不能使文化史家们得到满足,同时使本书的方法显得略微陈旧。包括达恩顿在内的各位学者必然会发展出一些新的途径来重新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也就是从“怎么样”到“为什么”。本文通过简述心态史学和达恩顿本人在历史人类学方面的理论进展,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这两个角度,来修改问题并提出某些解决问题的策略。限于篇幅,笔者只详细讨论第一个问题,但后两个问题是与它密切相关的。在最后一部分,笔者将简述《催眠术》对之后著述的影响。

二

首先我们需要看看达恩顿是怎样回答“催眠术是如何在法国流行的”。在《催眠术》一书中,达恩顿并没有马上介绍麦斯迈尔的生平和学术生涯。为便于讨论,我们最好先把麦斯迈尔的早年经历大致交代一下。^②

麦斯迈尔在写作博士论文《行星流的物理医学》时开始思考动物磁性问题。动物磁性最早由赫尔蒙特(Jan Baptist van Helmont, 1580—1644)提出,认为有磁流穿过生物躯体。麦斯迈尔认为这种磁流或活力可以解释星辰对人类的影响。他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最终得出结论:整个宇宙弥漫着一种活跃而有效的成分,其作用就像电流或磁力一样。这种成分依照磁性规律对人体中的生命流体产生作用。于是他开始做试验,在病人身上放置金属磁铁,结果发现磁力引导病人进入催眠状态。1774年,麦斯迈尔治疗了一个患有如今称为神经官能症的病人。他发现用言语同样能对病人产生催眠效果,便最终放弃了使用磁铁。他认为疾病起因于磁流在身体里

^① Darnton 1968, p. 3.

^② 由于本节主要内容均引自达恩顿《催眠术》一书,因此仅在每段后加注,正文中除转引外不加引号。

的流动受阻。催眠疗法消除了这种阻碍,恢复了磁流在体内的循环与调和。1778年麦斯迈尔来到巴黎,掀开了催眠术运动的帷幕。^①

催眠术在操作时,身穿紫色丝织长袍的催眠师在符咒、占星术墙饰、厚厚的帷幕的背景下,激发梦游者的“第六感”来和死去或远方的灵魂进行交流,治疗所用器材在现在看来眼光来看也都奇形怪状。它带有如此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怎么还会作为科学史的内容加以阐述呢?

达恩顿给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催眠术理论深受当时的科学发现所影响。麦斯迈尔“渗透并浸润一切物体的”液体(fluid)是“引力的媒介,因为行星不能在真空中彼此吸引”,同时人体疾病则源于身体里的液体流动发生了障碍,通过施催眠术或按摩人体的“极点”来控制并加强液体的效果,就能克服障碍、恢复健康或人体与自然间的和谐。尽管麦斯迈尔的治疗方法现在看来荒诞无稽,但是从当时的科学进展来看,这种“无形的液体”并不算特别不可思议。从表面看来,它并不比拉瓦锡驱除的燃素以及取而代之的热量更加虚无缥缈。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也提到过“渗透并隐含在一切大物体之中”的“精气”,^②布丰、欧拉、拉普拉斯等人也时常提出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的抽象性与麦斯迈尔的“液体”不分轩輊。而18世纪的科学家在解释自然现象时,所蕴含的神秘主义因素也很浓重。最后,麦斯迈尔及其追随者以进步科学家自居,他们和那些招摇撞骗的江湖医生并不一样,他们拒绝与18世纪发展起来的科学断绝关系,并在一份催眠师清单中罗列了“洛克、培根、贝勒、莱布尼兹、休谟、牛顿、笛卡儿、拉美特利、本奈特、狄德罗、卢梭、布丰”等科学家和启蒙运动巨头的名字。正如达恩顿所说,催眠术处于从科学到伪科学的光谱的中间位置,它一方面极端地表现了启蒙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充满了源远流长的神秘主义。^③

与催眠术同时代的业余科学家的实验,则是普通知识阶层所喜闻乐见的。例如普里斯特利和诺莱(Jean Antoine Nollet, 1700—1770)等人就出版了许多指导人们自己动手获得科学实验乐趣的小册子。如当时巴黎的一位评论家迈斯特(J. -H. Meister)所描述的:“在我们所有的集会中,在我们用晚餐时、在我们可爱妇女的洗手间中,以及我们的学术讲坛上,我们只谈论实验、大气、易燃气体、飞行的双轮战车、在天空中旅行。”另一份报告也指出:“自从对科学的嗜好在我们之间传播开

① 本段内容主要引自赖尔2003,页380,对麦斯迈尔的早期学术生涯还可参考Benz 1977; Darnton 1968, pp. 47—48; Lanska and Lanska 2007, pp. 301—320.

② 牛顿2006,页349.

③ Darnton 1968, pp. 3—4, 10—12, 36—39.

后,我们已经发现公众一直在忙于研究物理、自然史和化学;发现他们不仅关心其进步,而且确实致力于他们的研究,公众对培训课程趋之若鹜,他们渴望读书,并热忱地欢迎一切给他们带来思想的东西,除了极少数情况,在富人家里都能找到适合于这些有用科学的实验器材。”^①

热气球的成功使得人们对科学的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783年10月15日人类第一次飞行的消息在法国引起轰动,激发了法国人的想象力,并带来无限商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气球飞行的狂热把科学的重要性楔入了普通法国人的头脑中,这是拉瓦锡在科学院进行学术报告所无法相比的……气球航行甚至能够触及那些完全无法读懂《物理杂志》(*Journal de Physique*)的读者。科学家给自然力量套上缰绳的能力以几乎宗教狂热式的敬畏启发了法国人——它的传播超越了巴黎的科学团体,超越了教育的限制,而且尽文学题材之所能,也超越了散文的边界。”随着热气球带来的科学热,众多打着科学发明的幌子招摇撞骗的好戏在法国上演,例如能在水上行走的鞋、在黑夜看到东西的技术等等。即使是很有教养的人,如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1757—1834),也一再为这类发明捐赠钱财,即使上当受骗亦不后悔,因为气球飞行给法国人带来了这样的信念:“人们刚刚征服天空,为什么不能在水上走路呢?在人的理性的指引下,在无形的力上还能加以什么限制呢?”^②

据达恩顿描述,当时催眠术是比热气球更流行的一种风尚。1779年至1784年,它一直处于稳定的发展阶段,而在1785年影响力达到顶峰。哈珀(Jean-François de La Harpe, 1739—1803)评论说,催眠术就像“一种遍及整个法国的流行病”。在催眠术最风行的时候,在1783至1784年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和《巴黎杂志》(*Journal de Paris*)中,催眠术很明显地比任何其他话题占据了更多空间。甚至1785年的《缪斯年鉴》(*Almanach des Muses*)中也充斥着和它有关的诗(多数怀有敌意)。书商哈蒂(S. P. Hardy)在他的私人旅程中记录说,催眠术的“狂乱”(frenzy)甚至盖过了对气球飞行的狂热。《秘密回忆录》说,“男人、女人、小孩,每个人都牵涉在内,每个人都在催眠。”迈斯特的意见完全一致:“每个人都被催眠术所占据。他被奇异事例所冲昏头脑,而且如果他承认怀疑它的威力……至少他不再害怕否认它的存在。”《欧洲信使》说,“首都舆论的最重大论题依然是动物磁力。”《布鲁塞尔杂志》也报道说:“我们只关心动物磁力……”催眠术在学院、沙

^① Darnton 1968, pp. 24—26.

^② Darnton 1968, pp. 18—24.

龙和咖啡厅里被争论。它被警察们调查,被皇后庇护,在舞台上被愚弄过几次,在流行歌曲、顺口溜和漫画中被嘲笑,在类似共济会的秘密社团中被演练,并被潮水般的小册子和书本所传布。它甚至闯进了麦斯迈尔的朋友莫扎特根据在维也纳的回忆而写的歌剧《女人心》里。总之,如果不考虑气球飞行在未受教育的法国人中的影响,仅就沉浸于沙龙生活的一般知识阶层而言,催眠术显然具有更为持久热烈的影响。^①

三

那么,为什么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处于从科学到非科学光谱中部的催眠术在流行程度上能够胜过热气球?甚至可以问,为什么热气球能够获得突如其来的成功?因为尽管知识阶层有对业余科学实验的热衷,但是前文也提到当时法国人对于各种世界观体系的困惑。催眠术和热气球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无形的力”的应用,但是比热气球抽象、神秘得多的催眠术为何能够迎合法国人的需要?

达恩顿在书中比较零散地回答了“为什么”这个问题,主要集中于催眠术蕴含的神秘主义传统。催眠术以及同时流行的几种其他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如颅相学等,之所以能够和热气球乃至充斥于报刊杂志的形形色色的“科学新发现”并驾齐驱,并不仅仅因为麦斯迈尔拥有一批持久稳定而且富有宣传才能的追随者(这批追随者后来经历了几次分裂),而在于它是根植于人们心态中的源远流长的神秘主义传统在当时的最新体现。事实上,催眠术或“动物磁性论”的思想根源在麦斯迈尔与学院派交锋的起始阶段就被指出,那就是“从帕拉塞尔苏斯时代以来不断发展的活力论”。但是即使是学术团体,也没有能力彻底认清科学和伪科学的分界线。他们反对麦斯迈尔,却支持同样用磁疗法的一名杂耍演员。^②在当时世界观的快速变化中,他们和普通知识阶层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而且不能每次都在“专制独裁”的科学指导下引出正确的方向。

但是我们知道,经历了启蒙运动的人们普遍对神秘主义和灵魂抱有抵触心理,牛顿也要把他对炼金术和巫术的兴趣隐藏起来,否则很可能会受到人们质疑。^③那么催眠术在法国普通知识阶层中的流行,是否能够揭示出与精英阶层不同的思想

^① Darnton 1968, pp. 40—41.

^② Darnton 1968, pp. 14—36.

^③ 赖尔 2003, 页 44.

和文化根源?达恩顿显然赞同这一点。他在书中数次提到,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考虑到研究者和当时宇宙论的差别。正因为有这种差别,经历了19、20世纪科学变革的我们才会不自觉地吧牛顿的炼金术、巫术思想从他的研究中忽略掉。^①很显然,这符合心态史的研究思路。

心态史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年鉴学派。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认为,一些事物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一种特定文化中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些原本可以共存的态度,在后世人的眼里却变得互不相容,“曾在口头文化被支持而在书面文化所抑制的集体无意识,取代或压倒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无意识……心理整体是在当时人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例如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那瓦尔的玛格丽特并没有很多顾忌地写下了放荡故事集《七日谈》,又写了《罪人灵魂的镜子》这本宗教诗集,这种天真的善意在我们现时道德中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现在不会像16世纪王室人物那样,抱着同样的善意和同样的任性态度来立身行事……这并不是说我们的道德标准不同了,而是说对这些准则的基本反应已有差异。”^②另一心态史的先驱人物是荷兰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他重视想象史的重要性。在《中世纪的衰落》中他提到:“对文明史而言,有关伟大生活的长久梦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③而对于“力量旨在娱乐,如果不是治疗的话”^④的催眠术,更让人想起赫伊津哈对游戏的论述。^⑤在达恩顿后来的论述中,我们很容易找到类似于由于“知识情境化”(contextualize)而导致的对过去文化缺乏“反思性”(reflexivity)的观点。例如他在一篇讨论启蒙运动与底层文学的文章中说:“让启蒙运动变得实际的一种方法是,用18世纪作者的眼光去观察它。”^⑥而在《屠猫记》中他写道:“在现代读者看来,这件事就算不至于让人反感,也实在是没什么好笑的……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了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⑦

但达恩顿后来与年鉴学派的方法并不相同,尽管他在《屠猫记》的开头依然沿用“心态史”这个术语。他与格尔兹的长期合作使他在著述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人类学方法。这一术语本出自牛津大学哲学家赖尔

① Darnton 1968, p. vii, 10—45.

② 阿里埃斯 1989, 页 170, 195.

③ Huizinga 1924, p. 82.

④ Darnton 1968, p. 52.

⑤ 赫伊津哈 2007.

⑥ Darnton 1971, p. 82.

⑦ 达恩顿 2006, p. 79.

(Gilbert Ryle, 1900—1976) 的两篇讨论“思想家”所作所为的问题, 但被格尔兹引入到民族志的编写中。由于人类学家对异国情调的关注本质上来源于排遣由于亲近而产生的乏味感; 这种亲近使我们对自己互相感知和沟通能力的神秘性熟视无睹, 相反对于异质文化的陌生感则成为人类学家的灵感所在。根据格尔兹的说法, 民族志除了“阐释性”、“阐释对象是社会话语流”和“阐释的目的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抢救对这种话语的‘言说’”三个特色外, 还包括“微观的描述”。而人类学的典型方法就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 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①这在《屠猫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上段所引《屠猫记》后还有一句话: “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可作为一项探究工作的起点, 因为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异文化最理想的入口处。”达恩顿也因此被称为“比格尔兹还格尔兹”。《催眠术》注意并处理了先前历史学家所忽视的“鸡毛蒜皮”的材料, 但该书严格说来还不是以阐释性见长的。

如果我们试图按照后来达恩顿惯用的手法去寻找解释催眠术流行原因的途径, 大概首先应从催眠术的治疗过程开始去探究它的仪式根源(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它要借用一些旧时的巫术? 它与之前的詹森派(Jansenism)、光照派(illuminati)等思想有何具体联系? 此外还要把握一些治疗过程中的细节。必须考虑到, 尽管经历了启蒙运动, 但直到欧洲近代早期的末段, 即1750年前后, 在大众心态方面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②心态史的长时间延续, 使得中世纪以来的文化背景应该依然在大众心理中发挥作用。而且按照催眠术运动东至莫斯科、西至美国的影响范围和长达数十年的活跃时间来看, 它的文化背景显然具有全球意义。笔者不禁设想, 假如达恩顿十年之后才开始讨论催眠术, 想必会有不同的取径。从现实来看, 《催眠术》一书中将讨论引向了从催眠术“宇宙和谐”的观点中寻找激进思想的源头, 这在思想史意义上同样吸引人, 但和探索当时法国普通知识阶层精神状态的目标似乎略有偏差。

四

另一解释策略来自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

① 格尔兹 1999, 页 3—36。

② 例如欧洲各地猎巫运动的终结, 参见 Sharpe 1996 等。金兹堡在《本南丹蒂》一书中, 也认为 18 世纪中叶意大利民间巫术风俗已近代化, 见金兹堡 2005。

学革命中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而拉瓦锡的例子则因为其典型性而被库恩着重提出。库恩认为,比起普里斯特利,发现氧气之后的拉瓦锡“就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①这种以格式塔心理学作为入门钥匙的理论,与格尔兹深描说的方向正好相反。后者是以深层社会文化背景来阐释个体行为,而前者则是从个体出发。

从字面上来看,“科学革命”有很强的政治史意味,库恩也乐于拿科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作比较。^②但是正如政治革命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大众文化一样,科学革命也很难感染精英分子之外的大众,即使在社会中存在着对科学进展的狂热心理。用库恩的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些,由于科学革命一般只在范围很小的共同体内发生,因此这个小共同体的成员就与旧范式下的人们产生了不可通约性。大多数学者认为技术史的发展是相对连续的,比科学史更富有层累的意味,^③同样,在面对大众时,技术的进步要比科学的进步更容易得到理解并产生流行效应。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狂热,并不是对拉瓦锡等顶尖科学家的疯狂崇拜,而是出于热气球的发明,并延伸至各种稀奇古怪但耸人听闻的“发明”,甚至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催眠术、相颅术等等。相反,拉瓦锡等学院派却被视为保守学术体制的代表、专制独裁的旧制度的鹰犬。拉瓦锡本人在大革命中被推上断头台,直接原因是由于他作为税务官遭到民众的反对,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却是他因拒绝马拉的论文而同革命领袖交恶。也就是说,科学革命往往会造成精英科学家与民众相脱节,不可通约性使得世界观发生改变的精英科学家们难以理解民众简单幼稚的狂热行为,而大众则认为精英们傲慢排外(这与当前的社会情形也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进步,以获取新颖知识为风尚的一般知识阶层所了解的往往只限于知识层面,他们难以弄懂这些知识的发现或推导所遵循的原理。而新的科学范式的产生和知识结构的更新令那些未经历科学革命的科学家,例如普里斯特利,和一般知识阶层处于同样的弱势地位。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贝克莱、布丰、林耐等人在解释现象时,往往会做出牵强附会的答复。麦斯迈尔的催眠术也是如此。它根植于一个古老的解释体系,这一体系是人们依赖感觉或旧范式就容易理解的,而在政府组织的针对催眠术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人们看不到对催眠术的有力反驳。名列调查委员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巴伊(Jean-Sylvain Bailly, 1736—1793)的某些理论甚至“难堪地”与麦斯迈尔的相关论点非常接近。同时人们并不

① Kuhn 1970, p. 118.

② Kuhn 1970, p. 93.

③ 如巴萨拉 2000, 页 23—25.

了解调查报告中在学理方面的追求,加上麦斯迈尔的追随者们对调查委员会调查方法的指责,这些无疑都降低了调查报告在一般知识阶层中的信用度。^①从科学规范的角度来看,必须承认这一报告是远胜于麦斯迈尔和“宇宙和谐会”成员的科学水准的,60年后也是由于对科学范型的靠拢而导致催眠术最终成为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在大革命前夕,这让麦斯迈尔的追随者们不服,并从催眠术和“动物磁性论”中衍生出一套激进的政治理论,最终完成了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激进思想向下层社会传递的使命。

《催眠术》一书还涉及启蒙运动的终结问题。达恩顿的主要观点是:“1780年代晚期的有教养的法国人趋向于拒绝冰冷的世纪中叶的理性主义,而代之以更吸引人的思想食谱。他们盼望超越理性的和合乎科学的神秘主义。他们埋葬了伏尔泰并麇集于麦斯迈尔周围。”因此浪漫主义逐渐取代了启蒙精神。这种情绪在1784年宇宙和谐会的一本小册子中就出现了:“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正在倒塌。人们终将厌倦一切,尤其是冷冰冰的理性。我们必须拥有……某些令人赞叹的、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的东西。”达恩顿也提到了大革命之后倾向于催眠术的知识分子的消沉情绪,例如对失意者杜邦(P. S. Dupont, 1739—1817)思想的刻画。^②但笔者认为,如果根据康德等人的观点,启蒙运动的目的在于“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③,那么大革命后人们对浪漫主义中的神秘因素的偏爱只是为启蒙运动的终结盖棺定论。实际上,当学院派被广泛认为是专制独裁的化身,而催眠术却在社会中大行其道时,这已经说明启蒙主义者理性化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甚至造成对手的反弹,结果该时代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们把自己给吞噬了。

如果我们对比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这两种阐释策略,如前文所说,研究道路很可能不同。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很可能会导致近代催眠术这一题材继续沉没于历史的水面之下。而当我们意识到现在存在于科学史角落甚至文学史中的一些人物,放到18世纪却很可能是人们心目中当之无愧的科学家,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催眠术的文化价值。

五

行文最后,笔者愿根据阅读过的材料简述一下《催眠术》一书的影响。如上所

^① Darnton 1968, pp. 38, 113; Bailly 2002.

^② Darnton 1968, pp. 136—137, 151, 165.

^③ 康德 2005。

述,此书叙述有些失之于简,方法甚至略有过时,但考虑到它出版于整整40年之前,不可不说具有先驱意义。事实上,后来关于催眠术的学术论著基本都引用了达恩顿的成果,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地位。

就笔者所读到的材料而言,与该书“最为相像”的并非科学史著作,而是李孝悌的《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李并没有大篇幅引用达恩顿的理论,而只是提到过几次他的名字。两本书选取时间段均在革命爆发前10年;研究对象均为“下层社会”和民间启蒙;实施者并非文化界精英人物而通常来自民间;使用材料基本都以当时报刊、小册子为主;两者都考虑到大革命前10年并非政治最黑暗的时候,相反却有一定改良,这是将研究视角投向底层的出发点之一,所用事例均以证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交流为目的;李的著作有启发性,但基本未涉及对文化的深层分析。

由于催眠术的影响范围极为广泛,从美国到俄罗斯,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都有值得研究的内容。因此自达恩顿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英美催眠术的论著,这些著作几乎都把目光投向了普通民众。例如哈岑的《美国乡村启蒙运动》讨论的三个科学史问题中,就有一个是美国催眠术的影响和发展。^①而温特的《被催眠者》非常完整地讨论了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催眠术运动情况。^②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两种切入点。《催眠术》一书提到过巴黎宇宙和谐会同外省分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处于文化边缘区域的外省分会比较独立的发展状况,当然还提到过一度走红的来自印度的催眠师,这些都含有中心与边缘的意味,但并不深入。^③对于殖民地催眠术研究的概览性了解可参考恩斯特的论文,^④前述温特的著作中也有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的催眠术的讨论。^⑤

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史领域很少有将心理学史同社会文化史相联系的论文,著作就更少。只有台湾学者做出了一些成果,例如巫毓莹的论文《消失的愤怒》,讨论了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的心理状况。在科学史编史学领域,我们固然有像夏平“科学家的实验是内部和外部有同样多的社会因素,而它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发展同样内在”^⑥这样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借鉴达恩顿的《催眠术》一书,把目光转向布克

① Hazen 2000, pp. 113—147.

② Winter 1998.

③ Darnton 1968, pp. 66—69, 140—142.

④ Ernst 2004, 该文后附有比较全备的参考书目。

⑤ Winter 1998, pp.187—212.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中心与边缘的理论性综述可参见伯克 2005,页 28—77.

⑥ 夏平 2004,页 9.

哈特和赫伊津哈以降的当前史学界最热门的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传统,应该会得到一些启发。

参考文献

- Bailey, J. S. 2002. Secret Report on Mesmerism, or Animal Magnetis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Hypnosis*. 50 (4): 364—8.
- Benz 1977. *Franz Anton Mesmer und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animalischen Magnetismus"*. Mainz: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 Darnton, R. 1968.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arnton, R. 1971.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and Present*. (51): 81—115.
- Ernst, W. 2004. Colonial Psychiatry, Magic and Religion: The Case of Mesmerism in British India. *History of Psychiatry*. 15 (1): 057—071.
- Hazen, C. J. 2000. *The Villag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niversity.
- Huizinga, J. 1924. *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ska, D. J. and Lanska, J. T. 2007. Franz Anton Mesm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nimal Magnetism: Dramatic Cures, Controversy, and Ultimately a Triumph for the Science Method. in H. Whitaker, C.U.M. Smith and S. Finger (eds.). *Brain, Mind and Medicine: Neuroscience in the 18th Century*. Springer.
- Sharpe, J. 1996. *Instruments of Darkness: 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0—1750*. Penguin.
- Winter, A. 1998. *Mesmerized: Powers of Mind in Victorian Brita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Young, J. H. 1969.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Science*. (163): 1318.
- 阿利埃斯 1989. 心态史学. 见勒高夫等编《新史学》. 姚蒙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68—196.
- 巴萨拉, G. 2000. 《技术发展简史》. 周光发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波林, E. G. 1982. 《实验心理学史》. 高觉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伯克, P. 2005. 《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杨豫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达恩顿, R. 2006. 《屠猫记》. 吕健忠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 丹皮尔, W. C. 1975. 《科学史》. 李珩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格尔兹, C. 1999. 《文化的解释》. 那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赫伊津哈, J. 2007. 《游戏的人》. 何道宽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 金兹堡, C. 2005. 《夜间的战斗》. 朱歌姝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康德, I. 2005. 论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 见 J. 施密特编.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徐向东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赖尔, P. 2003. 《启蒙运动百科全书》. 刘北成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墨菲, G.等 1980.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 林方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牛顿, I. 2006.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王克迪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帕拉蕾丝-伯克 2006. 《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 彭刚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庞冠群 2007. 自下而上: 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 《史学史研究》. (2): 93-100.
- 王晴佳 2002. 《西方的历史观念》.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巫毓荃 2007. 消失的愤怒——日治晚期藤泽荷的原住民心理实验. 《新史学》. 18 (2).
- 夏平, S. 2004. 《科学革命: 批判性的综合》. 徐国强等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